

美国社区养老模式借鉴

近期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草案对养老重新定位,将现行法“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修改为“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居家养老”的提出实际上是要实现从传统的家庭照料到现代的社区照料、老年人的生活单位从家庭向社区的转变。居家养老的实质是社区养老。

在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美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美国,社区具备了强大的助老功能,使得美国老人能区内安其心、外交其身,实现“安养一乐活一善终”的老年生活目标,所以多数美国老人选择社区养老模式。美国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有几种做法:

一是全托制的“退休之家”,设施完备,服务周到。设施包括了医务室、图书室、计算机室、健身房、洗衣房、紧急呼叫系统等。服务包括了就餐、打扫房间、组织活动、出行安排等。

二是日托制的“托老中心”,白天在中心活动,晚上回家休息。中心同样设施完备,并提供星级服务。起居室内一人一床,一人一房。还有阅览室、保健室、活动室等。老年人除了不用为一日三餐操心外,还可以阅读、交往、制作手工艺品,安度晚年。

三是组织“互助养老”。让老年人结伴结对,互助养老。

四是提供上门服务。美国政府有一个福利性居家养老项目:由政府财政出钱,派家庭保健护士为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服务。家庭保健护士不同于保姆,她们不仅仅为老年人做饭、洗衣、打扫卫生,还得有护理知识。但前提是美国公民,有永久绿卡,才能享受这些待遇。移民美国的中国老人,一般是通过儿女申请拿到绿卡。老人居住年满加入美国籍之后,就能享受美国老人的一切待遇,每月700多美元、住房保险等都是国家的事情。

美国家庭护理员制度支持了居家养老模式。真正有品质、有保障的养老必须做到物质保障、照料保障、医疗保障和精神保障“四位一体”。家庭护理员介于家政服务员与专业护士之间,主要工作就是照顾住在家里或住宅式护理中心的孤独老人、伤残人士、长期病患者等。例如,在纽约每个区都设有一个护理中心,护理员由该中心管理调配。中心根据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与自理能力,决定护理员在服务对象家的天数。一般情况下,老年人健康状况尚好,又有自理能力的,每周安排3天,护理员上午8时上班,下午6时下班,每天8至12小时;如果出现急病或意外伤害,护理中心会调整护理员工作的天数;对于健康状况不佳、又没有自理能力的老年人,每天有护理员陪伴在他们身边。每天护理员到服务对象家上班时,即在那里打电话向护理中心报到,说明已经到达服务对象家。同时护理中心的管理人员还经常到服务对象家了解护理员的表现,并征求服务对象对护理员与护理工作意见与建议,对于业绩好的护理员及时予以表扬与奖励,对于表现差的护理员给予适当的批评、教育或处罚。护理员一般每小时工资6至12美元,工资由护理中心支付,服务对象不需付钱。

美国还拥有目前世界最大的非营利性质的老年照顾机构“居家养老院”。在美国50个州有5000个社区分支机构,拥有美国最庞大的义工队伍,每天都有80万至120万名义工将100多万份热饭热菜送到行动困难或者无法自己解决膳食问题的老人家中。

全球社会对“社区养老”逐渐达成共识,打造“养老社区”成为趋势。美国的社区居家养老是“品质养老”的典范,其优质服务 and 品质生活让人产生快乐的感觉。人托老人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交费,差额部分由联邦政府的财政补贴和社会捐赠弥补,从中体现了政府的养老责任和社会的人道关怀。

美国养老社区的四种类型

在美国,养老社区一般分为四类:生活自理型社区、生活协助型社区、特殊护理社区、持续护理退休社区。一般地,社区与医院和专业护理机构均有紧密合作。其中,生活自理型社区主要面向年龄在70-80岁之间,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生活协助型社区主要面向80岁以上、没有重大疾病,但生活需要照顾的老人。社区提供包括餐饮、娱乐、保洁、维修、应急、短途交通、定期体检等基础服务,并可通过付费方式享受其他生活辅助服务、用药管理及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症或老年失智症)的特殊护理。特殊护理型社区主要面向有慢性疾病的老人、术后恢复期的老人及记忆功能障碍的老人。社区内设有专业护士,提供各种护理和医疗服务。持续护理退休社区面向那些退休不久、当前生活能够自理,但不想由于未来生活自理能力的下降而被迫频繁更换居所的老人。为了实现对人住老人的持续护理服务,此类社区一般是生活自理单元、生活协助单元与特殊护理单元的混合。

以上四种模式,生活协助型社区在过去几年发展最快。目前,全美共有1900处持续护理退休社区(CCRC社区),但82%为非盈利性组织所有,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传统养老院转型而来的。对于盈利性的养老社区运营商来说,生活协助型社区的占比通常在50%以上,而CCRC社区占比一般不到10%。

我国社区养老发展的趋势

老年人口的高龄化、空巢化和失能化是普遍的趋势,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超过2000万,失能、半失能老人约3300多万,对社区照料的需求日益增大。老年人在熟悉的社区环境里能找到安全感、归属感和亲切感。依托社区发展居家养老服务意义重大,是积极应对少子老龄化、老年空巢化、空巢失能化的正确选择。

我认为,我国社区养老模式包括了居家式社区养老、公寓式社区养老和医护型社区养老三种。多数长者的养老模式属于居家式社区养老,生活在传统社区中,养老的照料和情感支持主要来自家人和朋友;公寓式社区养老就是专门的老年公寓,有完备的养老服务设施 and 养老服务,可以为完全健康和没有丧失自理能力的老年人提供专业的、个性化的养老服务;护理型社区养老属于高龄社会发展阶段会出现的养老社区,主要针对失能不能自理的老年群体,采取的是长期医养护理模式,满足的是老有善终的最后需求。

无论古今中外,“安养-乐活-善终”是养老三部曲,这也是老年生活的三个核心追求。目前,我国已经提出建设老年友好型城市和老年宜居型社区的目标,还应该朝老年友好型社会、老年安养型社区和老年乐活型家庭目标做出努力,提升居家养老的社区支持能力,增加居家养老的社区资源供给是着力点。我国更需要在于传统的社区中改善助老养老的功能,提高普通老年人居家养老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重视社区的医养护理功能和精神赡养功能。

穆光宗

(作者为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保持党性纯洁应养好“五气”

中医认为,健身之道重在养身,养生之道重在养气,气行血行,气滞血淤。儒家认为,气充满于人体并作用于心志,气足方能“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如此说来,养气不仅能强健体魄,更能净化心灵。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保持党的纯洁性的要求,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应注重养好“五气”。

一要养大气。有大气方可顾大局。共产党员的大气就是个人利益服从人民利益的本能态度。这种大气源于对党、国家和人民的忠诚,源于坚定的理想信念、源于对个人名利地位的置之度外。新形势下,纯洁党性对共产党员大气风范的要求没有变,共产党员应把自身价值融入党的事业之中,牢固树立“党兴我兴,党荣我荣”的大局观念,变自觉为本能,做到对党的信念更加坚定,对个人利益更加负责,对个人名利更加淡泊,把牺牲小我实现大我作为价值追求回报组织,力戒自私自利的小家子气,力戒为进步升迁、福利待遇斤斤计较,力戒为蝇头小利而丧失党性原则。

二要养正气。正气是一种气节,一种品德,一种修养。共产党员为人、做官、做事,需要正气,需要正义感,正气是有效应对“消极腐败危险”的良药。孔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许多不良现象、工作阻挠,都能从正气不足中找到根源。俗话说得好:“正人先正己。”党员干部都要从自身做起,挺正气,蓄底气,做表率。正气在身,定能面对诱惑有章法,面对挫折有办法;定能在利益面前敛私心,定能经得起实践、群众、历史的检验,在党和人民的事业大舞台上大展抱负和才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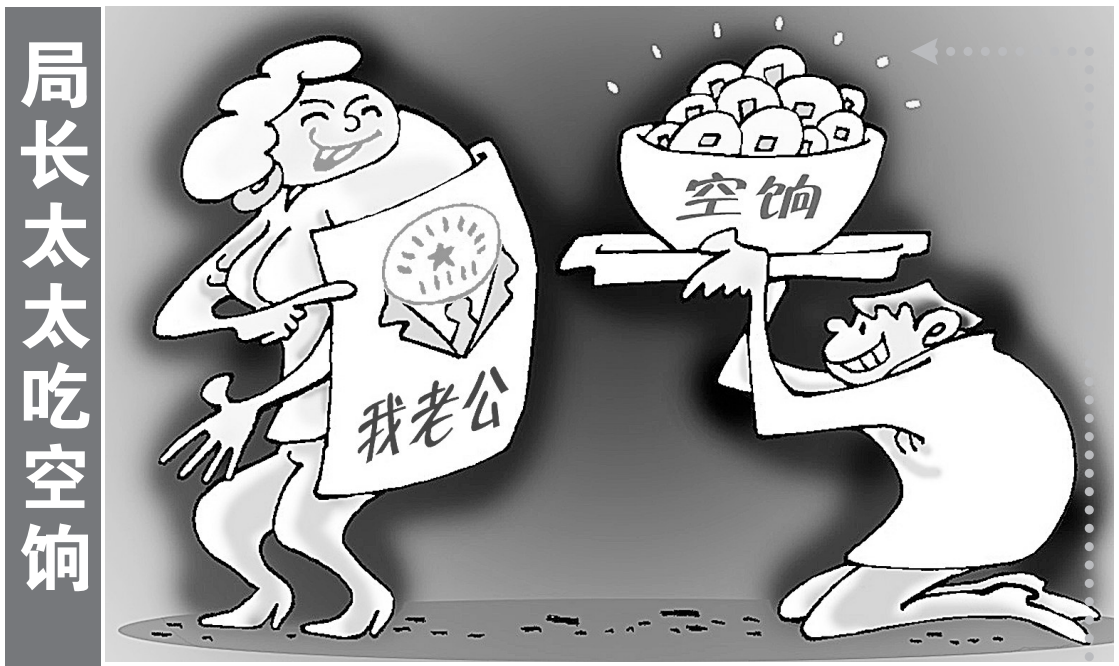
三要养才气。《辞海》解释,才气就是才能,就是较高的思维或办事能力。党员干部肩负着党赋予的历史重任,养才气长本领是必备条件,是应对“能力不足危险”的有效途径。“腹有诗书气自华”,这种才华才气,就是通过勤读书、多学习、广历练、常思考而积蓄

的干事创业的“元气”。当前,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对党员干部适应社会、立足社会提出了新要求。对此,一定要做学习型党员、学习型干部,博览群书,博闻强识;一定要注重实践,实践出真知,宋代诗人陆游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既是我们养才气基本动力,更是才气得以展现的舞台,党员领导干部要学会在实践中炼才气、悟才气、展才气。

四要养锐气。锐气是一种胆量,一种魄力,一种攻坚克难的品质,一种改革创新的精神,是有效应对“精神懈怠危险”的良药。当前,建设和谐社会同样面临压力和困难,党员干部必须有“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的魄力。敢于正视发展中的困难,勇于面对前进中的矛盾,以不达目的誓不休的态度开创事业新局面。

五要养人气。这里的“人气”不是你好我好一团和气,不是两肋插刀哥们儿义气,而是密切联系群众、心系人民群众之气。革命战争年代,广大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建立了鱼水深情。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很多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共同奋斗、克服困难的进程中增进了相互感情。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党的这些好传统、好作风不能丢。当前,养人关键在于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落到实处,把群众呼声作为工作信号,把群众需要当首要任务,把群众利益放在突出位置,把群众愿望作为重要目标,把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办事情、做工作的根本着眼点。要善于把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凝聚和发挥出来,真心实意地尊重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摆正位置,放下架子,甘当群众的学生,善于从人民群众身上汲取前进的力量,善于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白爱军



《华商报》报道,陕西省延陵县二中实行“改革”,一次解聘了59名教师,而连续3年吃空饷的县教育局局长的老婆还能留任学校,照样吃着空饷。现在一提“改革”,有些单位似乎就只有解聘员工这一条内容。假如员工中确有素质不高敬业不强甚至违纪违规且不听劝告,因而不解聘不足以整肃纲纪的,当然没什么可说的。但是某些单位在用对方方面采用的却不是唯才唯德唯德的原则,而是另有一套潜规则,“只看背景”便是其中的主项之一。吴之如文/画

生态文明的市场化路径选择

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下,必须通过改善资源配置和资源使用效率来提高人的福利,也就是说,应通过高效的经济社会手段,在经济稳定和对增长的同时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这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着力点。

在当今世界生态文明建设成就来看,环境的产权交易是比政府干预和自由市场更为有效的处理环境问题的手段。环境问题的产生,是某个经济主体的活动可能影响着其他主体的环境,却没有对此作出补偿,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往往难以避免这种行为的产生,面对这种情况,传统的应对措施就是政府干预。然而政府干预理论却将政府的能力与目标过于理想化了,把政府能力看得过高了,实际情况是政府部门可能被环境污染企业所绑架。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应当使环境产权化,明确环境的权责和归属。在许多情形中,环境破坏的原因就在于没有明确改变或保持环境不变的权利归属,这也使得相应的补偿机制失去了基础。

因此,“产权”是推动生态文明、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环境产权交易是环境问题市场化解决机制的具体化,它在现实中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并且对于环境保护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对环境产权交易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性的总结和研究成果成为时代的必然需求。目前,国内已有学者在此方向进行开拓性研究。对环境产权交易市场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进一步揭示其市场结构和运行规律,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亟待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环境产权交易不仅是一项环境保护政策,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环境保护、低碳经济、金融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意义,而且涉及国家利益和战略安全。我国近年来一直在探索环境产权交易制度和平台建设,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目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依然比较突出,环境保护和环境产权交易政策、制度还有待完善。不可忽视的是,我国的环境保护已经出现了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因污染环境而使部门、个人等获益,可人民群众的生活却受到了巨大影响。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顶层设计考虑环保体制的改革。当然,市场化并不是说谁有钱谁就可以拿到污染环境的许可证,而是在于通过市场约束来取得环境保护之于公共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以市场约束为护法,生态文明才能真正落到实处。环保失策的后果将危害后代,不可不慎重,我们不能念歪了经。

张启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下班沉默症”折射“情感工具化”

生活中,常有一些人在上班时侃侃而谈,回到家却疲惫懒言;聚会应酬时笑容满面,面对亲友时却麻木冷淡。这些上下班时间判若两人的人群,似乎患上“下班沉默症”,对正常的情感交流置之不及,甚至拒绝亲友的抚慰,进入了交际怪圈。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2750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3.1%的受访者坦言自己不同程度上有“下班沉默症”。

在探讨“下班沉默症”之前,笔者想先说说另外一种社会性现象——“阅读沉默症”。这些年来,各种权威的调查数据都表明,我国国民的阅读率都在持续下降,但同时,我们的出版业却没有走向萧条。与以往有区别的是,一些纯文学和哲学类书籍刊印在市场上消滞,而各种专业实用书籍越来越丰富和庞杂,尤其是一些职场“圣经”类书籍更是盛行不衰。比如《细节决定成败》等。所以,如今人们不是不读书了,而是读书的“目的性”强了,往往带有功利的动机。

从“阅读功利化”来审视“下班沉默症”,就不难发现其中有“异曲同工之妙”。换言之,下班后的情感交流变得稀缺甚至有意回避,不意味着情感表达的退化,而是情感交流日趋“工具化”而导致的某种必然结果——职场上,无论是与上级和同事交流,还是应对客户,都关乎

职场升迁和职业利益,“笑容满面”的情感交流其实更多是以程序化路径出现,作为一种工作载体,没有多少真情含量。而与亲友的交流则不能形成互动的利益链条,“下班沉默症”的存在也就不那么奇怪了。

“情感工具化”其实不仅有“下班沉默症”一种表现形式。之前曾经看过一则报道,据悉春节期间,中国各类短信发送量累计达到230亿条,以2009年末中国7.47亿手机用户数计算,平均每人发送短信30.8条。我相信这种数据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水分,每逢佳节,拜年祝福短信就铺天盖地飞来。只不过,短信虽然多,但却同质化严重,不是群发就是转发,发短信拜年其实更像是一种形式和“例行公事”。

事实上,现代人已过去太依赖于现代化的工具来表达情感,也渐渐习惯了将情感物化和职业化,只要能带来利益,只要能节省时间,只要能更有效率,只要能更方便快捷……情感表达“工具化”已经俘虏了我们的传统人情信仰。可人是有情感的高级生命,我们是维系社会交往和人际交流的情感纽带——正如汽车不可能取代走路,电脑不可能替代写字,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被动或被动地让工具主宰了我们的情感世界。否则,我们失去的不仅是情感,还有灵魂。 陈一舟

在当今“道德滑坡”的舆论纷扰中,食品安全危机、官员腐败、政府不作为、老人跌倒无人敢扶等社会问题,令人扼腕叹息。但与此同时,最美教师张丽莉、最美司机吴斌等“道德模范”的出现,又不禁让人心生温暖。那么,究竟该如何评价当前我国社会的道德状况?公众最反感哪些失德现象?怎样进一步加强道德建设?

人们要判定某个社会或某个时期社会道德水平的高低起落,是个极其困难的问题。我们不能根据某一标准、某一尺度确定社会道德水平是滑坡,还是爬坡。

“道德滑坡论”和“道德爬坡论”的争论

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社会道德现状的判断,一直存在着两种观点:“道德滑坡论”和“道德爬坡论”。这一讨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9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潮。目前,对当前中国社会道德现状的判断依然围绕这个争论。

一种是对我国现阶段的社会道德状况持肯定态度和观点,承认中国社会道德现状的总体是好的,但也存在着问题,正在艰难地“爬坡”,同时带有道德建设的艰巨性与长期性的含义,被称之为“道德爬坡论”。

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社会道德处于退步当中,甚至到了极其糟糕的地步,离经叛道、道德沦丧等道德失范现象频频发生。中国社会道德正遭遇“严冬”,充满危机,亟待“拯救”。这就是所谓的“道德滑坡论”。这种观点颇有市场,因为它满足了人的主观感受,而非理性的分析,因为它确实符合了现实中的一些现象,但却缺乏对问题本质的深刻分析。

道德是极其复杂的现象。一是内容丰富性,作为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在社会各个领域里分别有着不同的具体要求。二是时代性,在不同的时代突出和强调不同的方面。三是道德主体的状况的复杂性。不同的社会和时代里的人,同一社会阶层乃至每个具体的人,其道德水平和道德表现也会有差别和不同。因此,人们要判定某个社会或某个时期社会道德水平的高低起落,是个极其困难的问题。至今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制定一个测量社会道德水平高低的标准体系。我们不能根据某一标准、某一尺度确定社会道德水平是滑坡还是爬坡。

“道德滑坡论”和“道德爬坡论”各自的判断标准

但是,既然能够作出“道德滑坡”或“道德爬坡”的判断,实际上已经暗含了判断的标准或尺度。这两种观点都有着某种事实依据,都能说明某些现象,但同样明显的是,两种观点都只是用一些预先假定的一般道德价值原则去评价现今的道德状况。

在作出“道德爬坡论”的判断时,前提是已经有了一个“道德高标”,而现在的道德状况是从这个“高标”滑了下来。“道德滑坡”,就是道德从一个较高的水平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这就暗含某种比较:现在的道德水准较之于原先的某个时期下降了。那么,那个“道德高标”是什么呢?人们所谓的“道德滑坡”是以何时的道德为参照的呢?实际上依据两种“标准”:一是怀旧式标准,即用以往时代(古代或改革开放之前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今天的道德,一旦发现过去的道德规范在今天不管用了,道德说教在今天失灵了,道德榜样的作用在今天失效了,就大呼道德“滑坡”、“退步”了,便捶胸顿足地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另一种则是理想性标准,即以完美的、理想化道德标准衡量现实的道德,如果感到现实的道德状况与美好的道德理想、希望、期待相冲突,便作出现实道德与理想道德背离的判断,便满腹失望地感叹“不尽如人意,难如人意”。

同样“道德爬坡论”也是有一个既定的标准,在低坡往高坡上爬,那么这个“道德低坡”又是什么呢?正在往上爬的那个“道德高坡”又是什么?这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尽管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大量的消极腐败现象,但道德的本质和主流正处在“爬坡”之中。这种评价背后的道德标准也有两种:一种是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来推论道德的进步,认为道德既然是由经济决定的,那么经济的发展与道德的进步总体上是一致的。另一种是以人们的道德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以新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道德观念正在形成标准。道德意识的进步与传统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是一致的。可见“道德爬坡论”背后实际上是“生产力标准”或“社会发展标准”。

“道德滑坡论”和“道德爬坡论”的局限之处

首先,无论是“道德滑坡论”还是“道德爬坡论”的标准,都存在着一定的不完善性。这种感情色彩比较浓的价值判断,既不能正确说明今天的道德状况,也不能为当今社会提出一种合理的对策。“道德滑坡论”看到了当前道德领域存在的问题,并且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和热切的期待。但“道德爬坡论”作为对现实道德状况的总体判断,首先在思想方法上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以一件好事来肯定总体道德现状的结论不够充分。同样,以一件败德的事件而作出否定总体道德现状的结论也不恰当。

其次,它没有看到这实际上是社会转型中道德系统的重新调整,没有看到道德危机中同时蕴含着生机,在衡量的标准上带有很强的情感色彩和非理性的特征。它虽然也依据客观事实,举出一系列败德事件,但不可能带有很强的主观感受,更关注当前的“不尽如人意”、“难如人意”。但是,善良的愿望不能代替客观事实,感叹、担忧甚至牢骚,都不能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道德爬坡论”注重的是实质性进步,注重从整体上看问题,强调要承认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是进步的,不要被某些局部的道德滑坡现象所迷惑。但它的不足也是明显的。“道德爬坡论”对社会整体进步来推出社会道德的进步,既忽略了道德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也来自发展过程中道德经常不一致这一事实相矛盾(尽管“道德爬坡论”者也承认这一点)。道德的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它除了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被经济发展决定外,还受生产关系直接决定、政治因素的影响,还有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以及受民族、国家道德制约,等等。人类历史上的每次社会转型,往往都要经历一番“道德的阵痛”。如果认为生产力进步了,经济发展了,道德也就自然进步了,这种判断是既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又显得过于简单和机械。

因此,讨论衡量和判断社会道德水平的标准和标尺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它同时也是我们道德建设的方向和目标。今天,中国社会道德建设的“道德之坡”,既不是古代的封建主义道德,也不是改革开放之前的道德,更不是西方的资本主义道德,而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承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的道德体系。它集中地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里,具体地体现在社会主义荣辱观里。道德建设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和理论体系与道德现实的统一。 李春华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室主任)